

全球智库半月谈

委内瑞拉光依靠石油能实现经济复苏吗？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

能源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角色的变化

德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

美欧贸易谈判困难重重

大国竞争时代的“航行自由”

本期编译

李芳菲

凌枫

尚见卓

申劭婧

吴克谦

王梦瑶

熊春婷

伊林甸甸

张寒堤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 张寒堤 邮箱:iwepceem@163.com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委内瑞拉光依靠石油能实现经济复苏吗? 7

委内瑞拉如今深陷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重建工作至关重要。光依靠石油产业不能帮助委内瑞拉走出困境,还需要持续协调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金融支持和技术支持。

经济政策

美联储的行为和川普的微博一致,并且是正确的 9

2019年3月美联储宣布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2.25-2.50%不变,并从5月份开始放缓缩表速度,于9月份结束缩表。美联储态度发生这样的转变是由于特朗普对其强硬态度的抱怨,还是另有原因——即鉴于当前国内外政权的不确定性?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 12

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可能导致全球危机风险积聚的潜在原因,并相应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本专栏讨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在应对金融部门风险积聚方面的有效性,并且,尽管这两项政策都有助于应对金融业风险积聚,但宏观审慎对于稳定金融更为有效,且可以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

放宽市场约束以减少道德风险 17

2008年金融危机规模之大,危害之严重,与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息息相关,这是由于有限责任和公共存款担保产生的不良激励所致。在有限(单一)责任制下,银行股东可能会承担过高风险,因为他们从风险项目中获得所有收益,但在亏损项目中仅承担有限责任。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鼓励银行承担风险,因为该制度减少了存款人监管和约束银行风险的动机。对此,政策制定者为了应对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问题,实施了旨在引导银行谨慎投资行为的规范与监管要求。

深度报告

德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 20

2019年2月发布的《德国2030:国家工业战略》是德国经济民族主义的一次回归。文件中主要有五条提议:提高德国和欧盟制造业份额;封闭欧盟区域内的价值链;修改欧盟竞

争法案，建立“国家和欧盟扶持”企业；国家积极干预以防止外国收购；对“任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活动”进行国家支持。下文对五条建议的提出理由和潜在后果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德国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战略观察

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可能来自德国 32

近期，有猜测认为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将会担任欧洲央行下一任行长。目前，欧央行使用货币政策措施的自由度在下降，因此在应对下次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至关重要，一位来自德国的行长更有希望说服德国带头实施逆周期财政政策。此外，魏德曼也很可能获得默克尔的支持。

能源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角色的变化 34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能源业的消费总量、技术水平与政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最近发布的一篇专题报告中，笔者就能源业未来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角色的变化做了集中分析。

不但担忧德国，也担心欧盟的国家主义 36

面对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威胁，欧洲各国希望采取措施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地位。但是，目前的政策已经走上了经济民族主义的道路，长远来看不仅不会达到目的，反而会使得欧洲之前繁荣的根基受到削弱。因此作者认为，这一势头必须得到遏制，欧洲应该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来保证其利益。

美欧贸易谈判困难重重 39

近年来，以钢铝关税和汽车关税为代表，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愈发升级。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前景如何？阻力来自何方？作者给出了分析，并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

白人种族恐怖主义有多严重？ 42

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新西兰两座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引发了人们对暴力极右翼分子威胁的新担忧。袭击事件发生后，西方民主国家就极右翼分子威胁的严重性展开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辩论。

大国竞争时代的“航行自由” 44

作者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美苏之间关于航行权利的争端及其解决方式为例，讨论了解决美国与中国之间关于海上航行问题的可能性及其方式。作者认为，有鉴于美国目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计划，伴随着美中海军之间的接触增多，美国海军与中国海军之间的行动环境将越

来越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之间的行动环境。尽管目前两国之间有协商机制，但存在关键性的缺陷，未来应优先弥补既有机制的缺陷，使之能够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智库介绍

本期智库介绍	46
--------------	----

委内瑞拉光依靠石油能实现经济复苏吗？

Moises Rendon /文 尚见卓/编译

导读：委内瑞拉如今深陷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重建工作至关重要。光依靠石油产业不能帮助委内瑞拉走出困境，还需要持续协调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金融支持和技术支持。编译如下：

曾经富饶的委内瑞拉如今已满目疮痍，深陷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经济危机。委内瑞拉 GDP 自 2013 年以来已经缩减了一半，预计今年的通胀率至少达到 10000000%。委内瑞拉民众每天面临食品药品短缺、全国大停电、缺少安全饮用水和卫生环境设施的艰苦生存条件。今年大约有 530 万移民和难民逃离委内瑞拉，他们迫切希望重获自由、重建新家园。但是，委内瑞拉面临的种种挑战空前绝后，其重建将会是西半球有史以来最戏剧复杂的转变之一。

目前破败的委内瑞拉已被临时政府和瓜伊多领导的国民议会控制，但要想走出困境仍需要持续协调的国际援助，使民众脱离痛苦的生存环境。委内瑞拉需要国内进行一场全面而迅速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技术金融支持来共同稳定国内形势和恢复经济。

尽管委内瑞拉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探明石油储量，但其石油产量仍不足以为国家重建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美国及其他援助国、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应在具有政治可行性时提供人道主义支持，作出紧急反应。一旦马杜罗不再掌权，要立刻挺身而出帮助委内瑞拉民众解决影响日常健康和生活的艰苦条件。此外，国内各部门也要联合实施政策改革，以保证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1、即使“打开石油龙头”还需数年时间恢复生产水平

委内瑞拉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创始成员国之一，石油工业的先驱。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曾是世界上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之一。然而，石油产业管理混乱、大规模的腐败和严厉的政策导致石油产量急剧下降。1998 年查韦斯当选总统时，委内瑞拉每天生产 350 万桶原油，2019 年降至 110 万桶。最新报告显示，由于美国对 PDVSA 公司的制裁，今年 3 月上半月石油产量下降至每天 65 万桶。

委内瑞拉通过增加进口和举债来应对生产水平下降所产生的问题。1999 年，委内瑞拉债务为 370 亿美元，到 2016 年债务超过了 1500 亿美元，相当于五年以上的出口总额。最终债务重组和金融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些还不足以让委内瑞拉的经济复苏。

如果后马杜罗时代经济复苏举措仍与能源产业密切相关，将无益于委内瑞拉的未来。委内瑞拉可调拨的财政资金有限、石油公司运营效率低下、钻井设备和

稀释剂短缺、电力故障等因素导致了石油产量下降。即使政权发生变更，政治不确定性和大选也可能会限制新政府元年扭转经济形势的能力。假设一种“软着陆”的情景，如果临时政府和国会控制了委内瑞拉的全部机构，哪怕是最激进的石油增产计划也需要长达 10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曾经每天 310 万桶的生产水平。

2、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援助

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委内瑞拉的重建至关重要。当前危机过后，委内瑞拉还将面临艰巨的恢复性和改革工作。然而，国际社会不能仅仅依靠“打开石油水龙头”来快速解决问题，因为还需要数年委内瑞拉才能恢复曾经的石油生产水平。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要在重建的初始阶段帮助委内瑞拉。美国、欧盟、多边开发银行、私营部门以及其他国际社会团体应把资本重组放在首位。

以往经验可以帮助美国和国际社会确定自身在帮助委内瑞拉重建进程中的作用。委内瑞拉未来的融资需求可能接近伊拉克重建工作。最新报告显示，伊拉克与伊斯兰国家的战后重建耗资超过 880 亿美元。据美洲开发银行（IDB）委内瑞拉总督和哈佛大学教授 Ricardo Hausmann 的观点，委内瑞拉需要至少 200 亿美元的融资、人道主义援助、技术援助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而对于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包括债务重组和融资援助，委内瑞拉至少还需要 600 亿美元。

援助国帮助委内瑞拉长远发展不仅有利于委内瑞拉国内稳定和地区安全，其自身也会在未来获得回报。而委内瑞拉在被援助的过程中也可以发展成为援助国的一个健康贸易伙伴，并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重新结盟。

本文原题为：“Can Venezuela’s Oil Pay the Day After Bill”。本文作者 Moises Rendon 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美洲项目的副研究员、副主任。本文于 2019 年 4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联储的行为和川普的微博一致，并且是正确的

Steve H. Hanke /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2019年3月美联储宣布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2.25-2.50%不变，并从5月份开始放缓缩表速度，于9月份结束缩表。美联储态度发生这样的转变是由于特朗普对其强硬态度的抱怨，还是另有原因——即鉴于当前国内外政权的不确定性？编译如下：

本周早些时候，美联储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2.25-2.50%不变。此外，美联储表示，它已经转向“鸽派”。相比于2019年的两次加息预期，美联储已表明未来将不会加息。而且还不止如此。从今年5月份开始，美联储将放缓其资产负债表中持有国债的缩减速度，从每月300亿美元降低至每月150亿美元，并于9月份结束缩表。

所有的这些“鸽派行为”必定会让特朗普总统倍感温暖。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推特上发文抨击美联储，抱怨其态度过于强硬。

美联储显然是看到了总统的抱怨。或许，也可能没有。毕竟，支持美联储新“鸽派”立场的论据之一是：鉴于国内外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该政权的不确定性是由特朗普自己造成的），采取该立场是有必要的。

美联储采取新的鸽派立场是正确的，至少数据显示是这样的。让我们忘记特朗普的推特，进行分析吧：

美联储做对了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观察广义货币供应量。事实上，对我来说，决定国民收入的货币分析才是最重要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是明确无误的。以2003年至2018年美国为例，其货币供应量（M4）年增长率为3.59%，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为3.62%。

所以当前美国的货币“温度”是多少？

首先确定货币供应的“黄金增长率”，然后比较美国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长率和黄金增长率。我将采用货币数量理论（QTM）来计算黄金增长率。货币数量论中的收入等式如下： $MV = Py$ ，其中：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供应速度，P代表价格水平，y代表实际GDP（国家收入）。

根据我的计算，2004年1月至今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1.91%，总货币供应量（M4）的平均增长率为3.86%，货币流通速度的平均变化百分比为-0.61%。美联储的通胀目标为2.00%，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得出美国总货币供应量（M4）的黄金增长率为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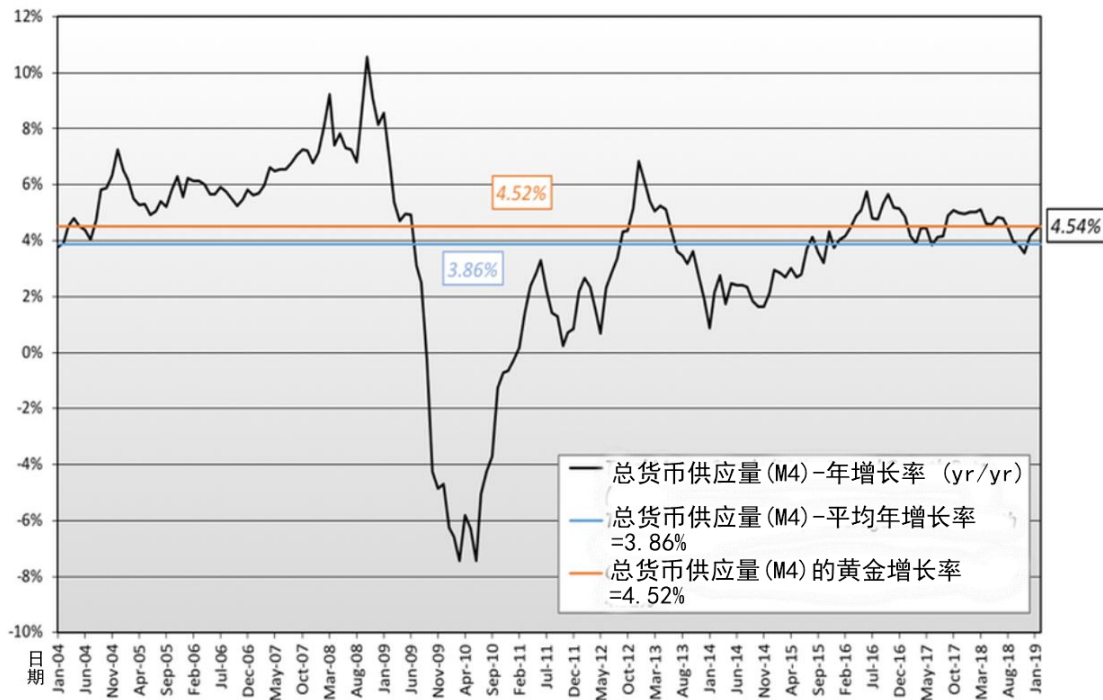
计算过程如下：

黄金增长率 = 目标通胀率 + 实际 GDP 平均增长率 - 货币流通速度平均变化率

美国的黄金增长率 = 2.00% + 1.91% - (-0.61%) = 4.52%

因此，货币供应量（M4）的增长率为 3.86%，落后于黄金增长率（4.52%）。（见计算过程和图表 1 所示）这表明，从 2004 年至今，美联储的压力一直比较大。但目前，M4 的年增长率为 4.54%，与 4.52% 的黄金年增长率基本持平。

图表 1 美国货币供给量（M4）[2004 年-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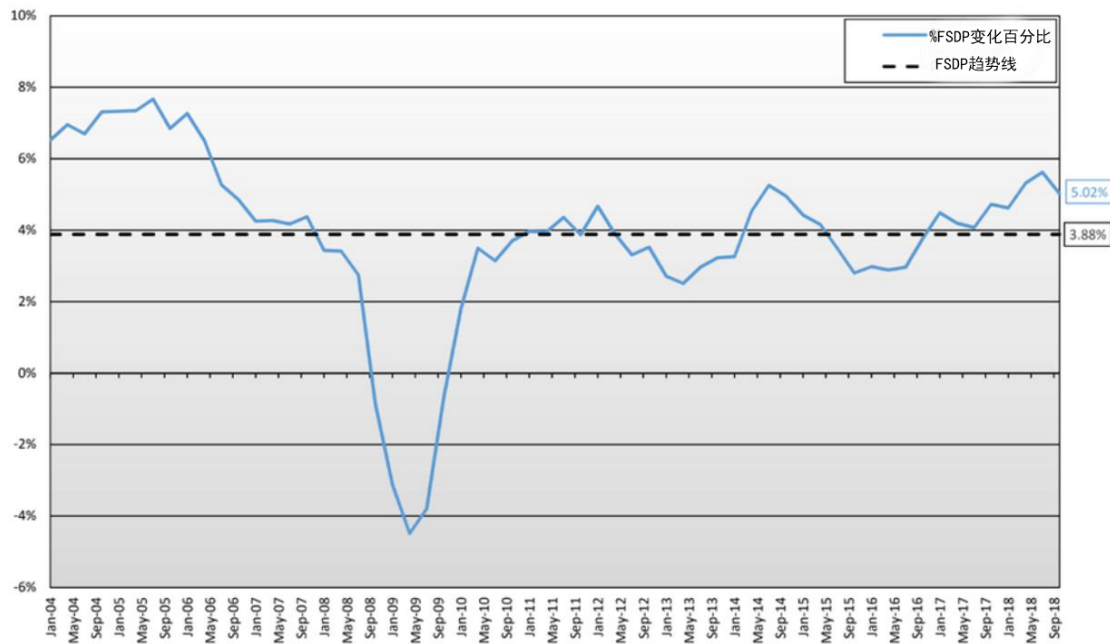
来源：经济学人智库，金融稳定中心。

备注：采用迪氏 M4 指数来计算货币供应增长率。

由 Prof. Steve H. Hank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

不出所料，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立场导致以国内最终销售额衡量的名义总需求（FSDP）年增长率达到 5.2%，如下表 2 所示。因此，当前美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十分接近黄金增长率，而且总需求也处于我们所预期的水平。似乎一切都在“好球区”。

图表 2 美国国内消费者最终消费量（名义）[2004 年-至今]



来源：经济分析司

备注：由 Prof. Steve H. Hanke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计算；

FSDP 计算公式为：FSDP=GDP+进口-出口-库存变化；

增长率计算期为：2004 年第 1 季度——2018 年第 4 季度

所以为什么美联储会转向“鸽派”？这一切都是源于政权的不确定性。事实证明美联储正密切关注特朗普总统，并且已经认定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即一个导致政权不确定性的人。事实上，总统出乎意料的曲折行径给国内外经济领域造成了普遍的不确定性。因此，美联储下调了经济预测，并明智地决定谨慎行事。

本文原题为“The Fed Follows Trump’s Tweets, and Does the Right Thing”。本文作者 Steve H. Hanke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CATO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CATO Institut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

David Martinez-Miera, Rafael Repullo /文 李芳菲/编译

导读：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可能导致全球危机风险积聚的潜在原因，并相应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本专栏讨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在应对金融部门风险积聚方面的有效性，并且，尽管这两项政策都有助于应对金融业风险积聚，但宏观审慎对于稳定金融更为有效，且可以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编译如下：

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可能导致全球危机风险积聚的潜在原因，并相应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本专栏讨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在应对金融部门风险积聚方面的有效性，并且，尽管这两项政策都有助于应对金融业风险积聚，但宏观审慎对于稳定金融更为有效，且可以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

为了分析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在缓解金融部门风险积聚方面的作用，我们不妨回顾 Smets（2014）在调查报告中所述及的两种主要的对比观点（也可见于 Adrian 和 Liang，2018）。第一种观点被其称之为“修正杰克逊霍尔共识”，这一观点认为，货币当局应当维持相对小范围内的价格稳定，并确保资源利用率稳定在可持续水平；而宏观审慎则追求金融稳定，二者各有其自己的工具，用伯南克（2011）的话来说，“货币政策过于生硬，不能用于解决常规出现的金融失衡风险；相反，货币政策应当继续关注宏观经济目标，转而使用更有针对性的微观政策和宏观审慎工具来化解金融稳定发展的累积风险”。

而第二种观点则倾向于“逆风政策”，根据这一观点，“金融稳定问题应当成为货币政策战略中次要目标的一部分”。Stein（2013）曾对这一观点做出过最为恰当的阐述，他说，“监管工具在迅速解决各种金融稳定问题方面能力仍有待提高。如果在潜在经济环境的刺激下，金融机构强烈的动机，例如，为了获取收益而承担更高的信贷风险，那么监管工具不太可能完全遏制这种行为”。他总结道，“货币政策，……相对于监管而言具有一个重要优势，即它能触及每一个缝隙”。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Martinez - Miera 和 Repullo，2019）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程式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评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对金融中介机构风险承担激励的影响，从而为这场论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该模型建立在 Martinez - Miera 和 Repullo（2017）的基础上，在这一模型中，竞争性银行可以通过监控其借款人的成本来降低贷款违约的可能性。

该模型包含了四种类型的代理人：企业家、投资者、银行家和消费者。大量企业家可以分为潜在的两类：安全型和风险型，他们的投资项目需要外部资金，这些资金由投资者和银行提供。银行监督着由银行家设立的机构，为风险型企业

家提供资金。投资者的特点在于其用他们的初始财富总额资助安全型企业家并为银行提供了债权性资金来源；银行家的特点则是其用初始财富总额为银行构筑了全部股权资本，可能还同时为安全型企业家提供了部分资金来源；而消费者的特点则在于其对安全型和风险型企业家产出的需求呈现了下降趋势。我们假设能够自由进入创业和银行部门，并假设投资者和银行家是风险中性的，且所有的代理商都是价格接受者。

货币政策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中央银行来实现。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设定实际无风险利率，从而影响投资者在安全型企业家和银行之间的资金分配。请注意，在此我们忽略了名义利率摩擦，而对实际利率进行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则是通过引入监管机构来构筑模型，该监管机构可以为银行设定最低资本要求，也就是说，该监管机构要求银行在每单位贷款中确保拥有满足最低数量要求的股本。我们强调这些法规对经济均衡结构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特别强调其对金融体系风险的影响。

1、金融部门均衡

为了分析货币政策、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之间的联系，我们着重研究了竞争性银行作为风险型企业家和(未保险)投资者之间中介的作用。企业家身无分文，而他们的投资项目需要资金，因此银行可以以一定的成本来监控企业家的风险项目，从而降低违约概率。同时，我们假设监控效果有一定限度，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作为模型中关键的信息摩擦因素。在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的情况下，(内部)资本作为经营者的自身投入，为监督借款人提供了风险共担式的保障机制，有效降低了银行的债务成本。

我们考虑的是银行家的财富总额和投资者的财富总额在期初已经给定的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均衡的衡量标准在于安全型企业家向投资者借款的比率，即安全率——这一比率定义了投资者从他们的财富中所能获得的回报；风险型企业家向银行借款的利率以及银行家又将从他们的财富中获得多少回报。此外，均衡的衡量标准还包括银行所选择的单位贷款资本(与银行杠杆比率成反比)、向投资者借款的利率(银行的债务成本)以及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的监控强度等。最后，通过消费者逆贷款需求函数，安全型企业家和风险型企业家分别从投资者和银行借款的利率决定了他们的投资。

平衡存在着两种可能。其一，银行资本稀缺，因而银行家能通过现有财富获得高于投资者的回报；而另一种可能则是，银行资本充裕，银行家通过现有财富获得的回报与投资者相同。在资本稀缺均衡中，所有银行家的财富均用于投资银行资本；而在资本充裕均衡中，银行家的部分财富还用于为安全型企业家提供资金。我们将重点分析资本稀缺均衡。

我们表明，在均衡状态下，银行将选择正的资本量和正监控水平，此外，中介边缘的监测强度也将上升。由于风险型企业家的贷款违约概率与银行的监控强度相关，因此，无论银行的中介利润率如何，其都是决定金融稳定性的关键影响因素。

在描述了模型的均衡特征之后，我们发现，投资者财富的增加（外生）将导致安全型和风险型企业家投资增加，债权和股权回报减少，中介利润降低，同时伴随着更高的杠杆和银行承担风险水平。我们还发现，银行家的财富增加（外生）则将导致安全型和风险型企业家的投资增加，债权和股权收益率降低，中介利润率提高，银行杠杆率和风险降低。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不仅仅是资金总额，投资者和银行家的相对财富数量也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关键决定因素，因为其将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对投资者和银行家财富总额的冲击将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关键驱动力量。

2、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的风险承担效应

货币政策通过引入新的代理人——中央银行来建立模型，中央银行可以改变安全利率。在模型中，我们假设了两种方式调节安全利率：假设（i），政府有大量未偿安全债务；假设（ii），中央银行可以增加或减少投资者持有的政府债务。这意味着投资者的初始财富将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投资于为安全型企业家和银行提供资金，而另一部分则投资于政府债务。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获得的回报相同，这一划分并不重要；但从总体角度来看，这一划分却至关重要，因为公开市场出售政府债券减少了投资者在私人投资领域的资金分配，从而改变了模型的平衡状态。

宏观审慎则是引入一个新的机构——宏观审慎监管机构来构建这一模型。该机构可以为银行设立最低资本要求。我们假设这一参数值对资本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并对该模型下增加这一要求对均衡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分析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增加了债务和股本回报，减少了对安全型和风险型企业家的投资，增加了中介利润，从而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此外，我们还发现，更高的资本要求提高了股本回报率，降低了债务回报率，将投资从风险型企业转移到了安全型企业，增加了中介保证金，从而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承担。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两项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方向一致，但更高的资本要求对化解金融风险积聚有着更为积极的影响，货币政策收紧则与之不同。高资本要求使得投资转向安全型企业，降低了安全利率，并降低了银行债务成本，从而使得中介利润率进一步增加，而正是高债务成本导致了进一步的风险承担，中间保证金增加。因此，我们认为，宏观审慎在降低银行风险积聚方面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我们还进一步考虑了这两种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许有些令人惊讶，产生的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在存在有约束力的资本要求时，收紧货币政策将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当存在具有约束力的资本要求时，风险型企业家的投资以及他们从银行借款的速度取决于资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货币政策收紧所导致的银行债务成本上升并未转化为更高的贷款利率，因此中介利润率下降，从而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

3、福利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可以有效地改善银行的风险承担激励，但由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也会影响均衡投资，它们在社会福利方面则可能代价高昂。因此，为了完成这一讨论，我们还进行了福利分析，这需要推导出社会规划目标函数。在积极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包括了投资者财富的回报、银行家财富的回报、企业家产出的消费者剩余，以及公开市场操作下假设以一次总付的方式转移给投资者的中央银行的利润或亏损。

在社会福利函数的帮助下，我们首先证明了放任这一模型达成自由均衡效率相当低下——也就是说，社会规划者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与银行面临的改善均衡分配的问题其实是相同的，其原因在于银行之间的完全竞争导致了中介利润率和监控强度过低。社会规划者由投资高风险型企业转移到安全型企业，中介利润率提升，同时银行监管得到增强，从而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提高。

在此之后，我们分析了最优独立货币政策、最优独立宏观审慎政策和两种政策的最优组合。数据结果表明，两种政策在金融稳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最优组合更接近于独立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而独立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又高于独立的最优货币政策。这两项政策的结合带来的福利增加，是通过进一步增加资本要求来实现的，且同时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这抑制了无风险利率的下降。

4、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模拟中央银行公开市场销售国债以提高无风险利率来分析货币政策紧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通过提高银行资本金要求来分析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两项政策都通过增加中介利润有效地改善了银行的监管激励。然而，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更严格的资本要求将使得投资转向安全型公司，降低安全率，而更严格的货币政策则减少了安全型和风险型公司的投资，提高安全率，因此宏观审慎对中介利润的影响较小，宏观审慎政策似乎是降低银行承担风险的更有效工具。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存在有约束力的资本要求的情况下，收紧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该结果强调了分析两种政策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我们通过构筑模型以进行福利分析来完成我们的讨论，表明自由放任资金分配实现的均衡效率较低，银行之间的竞争导致中介利润率和监管强度太低。因此，政府干预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我们发现，收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将增加社会福利。此外，我们还发现，他们的最优组合在金融稳定性和社会福利方面与最优的独立宏观审慎政策相当，而非最优的独立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论文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宏观审慎政策应该是解决金融稳定性风险的主要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模型是从名义摩擦中抽象出来的，假设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出售政府债券来提高实际利率，从而减少投资者分配给私人投资的资金。这一假设有助于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货币政策促进金融稳定的潜在机制。但实际上，人们希望能有一个更现实的货币政策模型。

此外，还应注意，我们支持使用宏观审慎政策作为提高金融稳定的主要工具这一结论建立在以下前提基础上：即正如我们在 Martinez Miera 和 Pullo (2018) 中所分析的，影子银行的存在可能会降低这些工具的有效性。

本文原题为“Monetary Policy, 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本文作者 David Martinez-Miera 是卡洛斯三世大学商业系金融学副教授，Rafael Repullo 为经济学教授，西班牙货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及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放宽市场约束以减少道德风险

Haelim Anderson, Daniel Barth 和 Dong Beom Choi /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2008 年金融危机规模之大，危害之严重，与银行过度承担风险息息相关，这是由于有限责任和公共存款担保产生的不良激励所致。在有限（单一）责任制下，银行股东可能会承担过高风险，因为他们从风险项目中获得所有收益，但在亏损项目中仅承担有限责任。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鼓励银行承担风险，因为该制度减少了存款人监管和约束银行风险的动机。对此，政策制定者为了应对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问题，实施了旨在引导银行谨慎投资行为的规范与监管要求。编译如下：

危机消退后，人们开始关注金融监管改革，许多措施旨在降低系统的脆弱性。这些措施出台的部分原因在于：由于危机期间实施了过多安全网，金融体系在未来反而更容易爆发危机。然而，因为目前的改革尚未完全解决基本的道德风险问题，应当采取何种恰当干预措施的辩论仍在激烈地进行。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机构主张通过以针对银行激励机制改革的措施来替代现有的高强度规范和监管，从而实现金融稳定。

其中的一项建议是增加股东责任，这将直接限制他们承担过度风险的动机。这想法由来已久，早在萧条之前，监管者就对银行股东实行双重责任制，以减轻银行的过度风险，降低银行倒闭的可能性，提高存款的保障性。在双重责任制下，如果银行破产并且结算净值为负，银行股东会被强制要求支付对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补偿，这个补偿是根据股票面值评估计算得到。

然而，文献提供了关于双重责任制是否成功限制银行过度承担风险的不同证据。虽然一些研究通常认为双重责任制不鼓励银行承担风险，但其他研究却发现双重责任制下银行承担风险上升的证据。例如，Jonathan Macey 和 Geoffrey Miller 发现，实行双重责任制的银行比那些没有实行该制度的银行具有更低的资本比率。结论不一致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双重责任制对银行承担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充满挑战。例如，存款人的内生反应是一个重要但又经常被忽视的复杂因素：双重责任制不仅增加了股东在资本游戏中的责任，还降低了存款人对银行监管的动机，因为受到更好保护的存款人减少了抑制银行冒险行为的动机，同时也减少了确保存款安全的动机。

我们研究双重责任制对银行承担风险的影响。首先提供一个简单模型，描述双重责任制对银行承担风险的两种相反作用。首先是道德风险的减少，因为股东在资本游戏中责任加重，然而双重责任制也降低了存款人的市场约束，这些存款人从保障性更强的储蓄中获益。在其他条件均相同情况下，这种市场约束的减弱实际上可能会导致银行承担风险的提升。

我们的模型分析了存在潜在的存款提取（也就是银行挤兑）的情况下，责任结构对过度风险承担的影响。如果存款人监管银行并且对负面信息做出反应，从而提取存款时，银行就会受到激励以避免过度风险。但如果有机制使存款免受损失，存款人对负面消息做出反应的动机就减少了。因此，双重责任制使存款“更加粘性”，减弱了市场约束并可能增加银行风险。该模型预测，尽管双重责任制使负面消息披露时的存款“更加粘性”，但是对于银行事前风险承担的总体影响尚不清楚。据我们所知，现有文献尚未讨论过降低风险承担的直接影响和减弱市场约束的间接影响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这种理论的模糊性表明，双重责任制与银行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最终是一个实证问题。然而，对这种效应做出可信估计具有挑战性，因为当地经济条件、规范和监管和其他不可观测的特征都对准确推断构成威胁。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使用在大萧条之前基于美国独特监管环境的新型研究策略。

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比较同时面临相同监管要求（例如资本和准备金要求，和其他分支限制），被相同监管机构监管以及处于相同地区经济条件但责任制不同的银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策略是将相邻州的国民银行与州立联邦储备成员银行（美联储成员行）在同一联邦储备分区（在本案例中为第二分区）中进行比较，但这两家银行要具有不同的责任制。虽然所有国民银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期都是双重责任制，但国民银行是根据国家的责任制规则运营的。具体而言，纽约州国民银行实行双重责任制，但新泽西州的国民银行实行单一（有限）责任制。

我们建立了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国民银行和州联邦储备银行从 1925 年 12 月 31 日到 1932 年 12 月 31 日的半年度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包含大萧条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使用历史时期的银行层面资产负债表数据可以减少使用现代制度资产负债表数据时出现的偏差，因为单位银行系统确保相同本土市场的银行可能具有相似的业务模式并面临类似的需求。我们使用国民银行审查报告和州银行报告来补充存款利率信息。这使我们能够通过价格和数量来检验存款人的行为。

我们的实证分析首先比较了单一和双重责任制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在 1925 年 12 月至 1926 年 6 月的扩张期间，我们研究了银行现金与资产比率、股本与资产比率，这些比率被广泛地视为流动性和资本缓冲的衡量标准。我们发现在大萧条之前，单一和双重责任制银行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差异。事实上，我们的点估计（虽然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双重责任制银行的流动性和资本缓冲比单一制银行弱。这些结果表明双重责任制并没有从这两个维度降低风险承担。

接下来，我们检验大萧条期间的存款流出，以检验双重责任制银行的存款是否比单一责任制银行“更有粘性”，但这也取决于银行的风险特征。我们的实证

结果表明，在大萧条期间，单一责任制银行面临的存款流出在平均每六个月的时间内比双重责任制的银行多 2.75 个百分点。与同期存款增长率的中位值-2.79% 相比，这一估计值在统计和经济学意义上都显著。线性概率模型的结果也表明，单一责任制银行在大萧条期间，比双重责任制银行经历存款净流出的可能性大将近 8%。相反，我们并没有发现在繁荣期间（银行倒闭的可能性低）双重责任制与存款增长率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

我们还检验了 1925 年、1927 年、1929 年和 1931 年新泽西州的国民银行和州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利率。结果表明单一责任制银行在整个期间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这表明存款人要求单一责任制银行提供风险溢价，以补偿对存款保护机制的缺失。结果还表明，在大萧条时期，国家和州联储银行的实际存款利率都很高且持续增加，这表明银行业的存款流出并非受银行低存款利率的引导。最后，结果发现尽管经历了更多的资金外流，单一责任制银行实际上在大萧条期间增加了存款利率。这表明单一责任制银行经历更大的资金外流是由于存款人提取存款而不是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所致。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股东激励调整与存款人市场纪律之间的冲突，双重责任制未能解决代理问题。通过要求股东在资本游戏中承担更大责任，从而提高存款的保障性和存款人的激励。换句话说，由于市场约束较弱的间接抵消效应，双重责任制在引导风险承担审慎上变得不那么有效。我们的结果与当前的政策讨论相关，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后，监管机构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增加责任，包括纾困，可转换债券和追回债券。这些政策可以通过将某些债权人的损失转移给股东来影响银行倒闭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这些政策可能会改善股东激励调整，但也可能会影响债权人的监管激励。

本文原题为“Reducing Moral Hazard at the Expense of Market Discipl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Double Liability before an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本文作者 Haelim Anderson 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研究人员，Daniel Barth 为美国政府金融研究办公室研究人员，Dong Beom Choi 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德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回归

Jeromin Zettelmeyer/文 张寒堤/编译

导读：2019年2月发布的《德国2030：国家工业战略》是德国经济民族主义的一次回归。文件中主要有五条提议：提高德国和欧盟制造业份额；封闭欧盟区域内的价值链；修改欧盟竞争法案，建立“国家和欧盟扶持”企业；国家积极干预以防止外国收购；对“任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活动”进行国家支持。下文对五条建议的提出理由和潜在后果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德国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编译如下：

最近美国、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采纳经济民族主义反映了全球转向保护主义——限制外国投资，对国内经济积极干预。这些政策由来已久，他们是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社会的产物，在20世纪30年代大行其道，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在大衰退之后更是负有盛名。

然而德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可能受到战后奥尔多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德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和对多边主义的政治承诺。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Peter Altmaier）于2019年2月公布《德国2030：国家工业战略》却是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一次回归，这令许多德国（特别是中-右翼派）评论家震惊，该文件提倡积极的产业政策。尽管文件尽力与20世纪30年代臭名昭著的经济民族主义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划清界线，但它的基调和大部分内容却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无论是德国还是欧盟意味上的）。具体而言，阿尔特迈呼吁：（1）提高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从现有的23%增加到25%，而法国或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占比只有德国现有水平的一半），提高欧盟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从现有的14%增加到20%）。（2）封闭欧盟价值链，并从欧盟外部进口。（3）指定特定的德国企业成为“国家扶持”企业。（4）修改欧盟竞争法案，便于创造“欧盟扶持”企业（即使这会伤害欧盟内部的自由竞争）。（5）允许国家购买企业股份，以防止外国收购。（6）对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工业部门进行广泛的**国家支持。

该政策简报描述了阿尔特迈的主要提议，并且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下分析经济价值。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三个提议——试图进一步提高德国制造业份额，限制非欧盟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大力支持德国和欧盟扶持企业——即使是对德国和欧盟自身利益的狭义解读，也是非常糟糕的政策。其余两个提议——阻止一些外国收购，增加国家对某些技术的支持——因为市场失灵和核心技术依赖外国公司会受到政治干预的影响，显得更为合理。但即使在这些领域，提出的具体政策可能利大于弊。这并不是因为阿尔特迈主张国家干预，而是他提倡了错误的国家干预。

基于这一分析，政策简报大致描绘了一种备选方案，以解决国家工业战略所关注的问题，即德国和欧盟正在失去技术优势，而那些不遵守欧盟政治和经济规则的国家很快就会侵占他们的份额。根据拟议的备选方案，欧盟和德国将会评估（有必要也会提升）现有产业政策的规模和目标。他们还将认真对待生产率增长的限制因素，这些限制因素超出了阿尔特迈所定义的政策范围，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以及形成单一欧盟市场的发展阻碍。另外，欧盟将对中国挑战做出全面回应。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运作良好的 WTO 机制和欧盟的政策工具包，以惩罚强制技术转让和非欧盟政府的国家援助行为，还可能要求国家支助的研发活动打破对威权国家的技术依赖。这些步骤需要一个强大的欧盟治理架构，在识别相关技术的同时避免假公济私，还要维持欧盟内部的竞争。

1、德国 2030：国家工业战略

国家工业战略政策提议建立在三个前提假设之上，（1）尽管取得现有的成就，但德国本应该做得更好。德国电子消费产业在与日本和韩国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更是无法在电脑和手机行业中有立锥之地，德国和欧洲在互联网经济中也没有占有重要地位。（2）德国在这些领域的失败要归因于公司缺乏规模或者缺乏像美国和日本公司所享受的产业政策。（3）德国汽车工业是制造业的核心，除非德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电池生产等领域有更好表现，不然他将面临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巨大竞争（这几个国家的成功都要归因于产业政策）。

该政策简报认为，德国队这些挑战的回应不应该涉及关税，“德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市场原则，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可能使本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我们希望减少和取消全球关税和税收，特别是对所有领域工业产品所征收的税（阿尔特迈，2019）”。相反，该文件呼吁新的产业政策，主要基于三个工具：补贴、国家对公司的直接干涉和欧盟层面竞争政策的改革。

该政策确定了五个优先事项：（1）工业活动至关重要，必须予以捍卫和扩张。“制造业附加值占 GDP 比上升到总附加值占比的 25%，对德国来说是有利并且可能的。”“欧盟作为整体，到 2030 年前需要将工业份额从 14% 提升到 20%。”“经验表明，一旦败给另一个竞争者，工业领域很难再收复失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每个工作岗位都据理力争，在区分‘脏旧’行业和‘清洁’新行业时有所误导性。”

（2）欧盟成员国仅能参与欧盟价值链。“保持封闭的价值链至关重要，如果价值链的所有环节都能在一个经济区域内实现，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完成，再到分配，服务和研发，价值链中个体的联结将更为紧密，并且有可能实现和扩大竞争优势。”

(3) 国家和欧盟扶持企业是必要的，并且应该被提倡的。“国家和欧盟扶持企业的关键是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具有临界规模的企业，从将法实现重要项目，也无法参与和其他大公司的竞争，这实际上会使国家被排除在日趋重要和壮大的全球市场之外。”“具有全球市场视野的德国和欧洲并购者经常铩羽而归，是因为在现行的法律下他们更加关注国家和地区市场。欧洲和德国的竞争法案必须要审核和修订，以使德国和欧洲公司有可能在国际层面展开竞争。”“对于西门子、蒂森克虏伯，汽车制造商和德意志银行的扶持大概已有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些企业的长期成功和存活符合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因为他们为增值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德国经济和工业展现在世面前的良好图景负责。”

(4) 国家必须为进行干预做好准备，以防止外国的恶意收购。“除了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时，对国内公司的海外收购仍应合法。”“在收购仅涉及到科技和创新领导力方面，而不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时，这仅仅是德国私有部门的事情，股东应该通过提供合适报价来阻止这种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在一段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充当买家。这种购买可能需要国家参与机制的创立。”

(5) 国家必须通过协调、财政支持和国家直接参与来支持“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进程”。“国家支持的范围和形式需要通过‘比例性的经济新原则’进行确立，进程的经济意义越大，国家的积极参与的活动空间就越大……这可以延伸到限时接管股份和给予补贴”“就电池生产问题而言，对增值连非常重要，国家援助（如支持辛迪加的形成）似乎是非常有帮助的”“相比之下，就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言，国家的直接参与（就像空客公司当时的情况一样），从而实现目标是必要且合理的。”

2、经济民族主义：起源

“2030：国家工业战略”标志着对战后德国传统的突破，不仅因为干涉主义，而且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对于经济民族主义者来说，国家的繁荣取决于赢得（或至少赶上）与其他国家的竞赛。经济民族主义者所接受的政策工具包历来包括保护主义、对内直接投资的限制、补贴、定向信贷和培育强大“国家扶持”企业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他们以牺牲外国利益为代价，促进国家经济利益（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经济民族主义具有显著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两者都认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繁荣，工业发展是合理的（实际上也是需要保护的，使国内产业免于外国竞争）。他们的想法影响了那些试图赶上大英帝国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德国和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发展出极端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促进经济自给自足，并叫停国内竞争，转而支持社团主义或辛迪加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民族主义在新兴市场国家也很受欢迎，包括亚洲和（主义实施不太成功的）拉丁美洲，这也是当今中国政策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试图打破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当时它将奥尔多自由主义视为新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意识形态。与 19 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不同，奥尔多自由主义主张国家扮演重要角色，但仅限于通过维持价格稳定，促进竞争和防止经济权力集中来界定和严格执行市场的游戏规则。

经济民族主义——关税，补贴，定向信贷以及对大规模公司的偏爱——是奥尔多自由主义极其厌恶的。联邦共和国的实际政策从未完全达到原始政策的设想。德国支持“国家扶持”企业，从金融到汽车行业，保护其服务部门，通过公私协调，对制造企业进行研发补助，为中小企业（SMEs）提供低成本信贷以及为初创企业提供支持的方式，积极投身产业政策。国家过往对于产业政策都是遮遮掩掩。除少数例外，产业政策要么被非民族主义的论点所贬低，要么被其激励，例如创新外溢效应。阿尔特迈的文件则不同，除了拒绝保护主义之外（鉴于德国的出口依赖，这并不令人惊讶），从德国和欧盟意味上来讲，他都是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者。

由于各种原因，主流经济学家经常否定（甚至嘲笑）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因为它混淆了公司间竞争和国家间竞争，而没有承认国际分工的好处，即各国均从进口和出口中受益。其次，它与战后经济繁荣的两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相冲突，即国际一体化和竞争。再次，由于其分配结果和政治易俘获性，国民主义经济政策使特定的生产者（工业企业，出口商，大公司）受益，却以其他参与者（进口商，小型竞争企业和消费者）的牺牲作为代价。因此，这些政策容易受到特殊利益的影响（Krugman 1994，Monopolkommission 2004）。与此同时，很难说经济民族主义总是坏的。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经济发展概念强调在专业化之前获得广泛的工业活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支持（Imbs & Wacziarg, 2003）。发展是否需要保护争议犹存，但有证据表明某些形式的保护加速了工业化（Irwin 2000）并提高了生产率增长（Nunn 和 Trefler 2010）。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甚至可以在长期改善福利。但阿尔特迈的提案不太可能是其中之一，倡导国家工业战略的国家都采用相同政策：提高制造业份额，将价值链留在一个特定经济区域，建立国家扶持企业，保有或发展某些行业的领导地位。这将导致全球市场缺少专业化、贸易一体化和国内竞争，在制品上却过度支出。

3、2030：国家工业战略对德国有好处吗？

考虑到中国和美国等国的行动，国家工业战略中提出的方法是否符合德国（可能还有欧盟）的利益呢？本节试图通过检验每个主要提案的潜在理由和可能产生的意外后果来找寻答案。

（1）**工业活动至关重要**。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对工业的偏爱有理可循。除了小型能源出口国以外，没有广泛的工业化进程，任何国家都无法变得富裕。从工业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有点难以理解，但依然可以想到两个论点：一是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通常高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如果保持这种趋势，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拥有较高制造业份额的国家应该增长更快。制造业活动可能存在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某种联系。失去核心制造业活动可能导致创新能力的丧失，这可能影响其余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最终危害该国的制造业基础（Pisano 和 Shih, 2009）。

第一个陈述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有意义，因为无法控制其他条件均相同。对于一组发达经济体而言，图 1 显示了 1995 年制造业份额与之后二十年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联，以及 1995-2016 年制造业份额和同期人均收入之间的变化。第一个面板中的相关性几乎为零(0.08)。这反映了制造业的份额开始时相对较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之间的差异大多由两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的跨国差异所造成。第二个面板的相关性统计显著且为负：制造业份额下降更多的国家往往增长更快。但这只是一种相关性，并不能支撑“抵制去工业化有助于发达国家更快增长”的论点。第二个可能的理由是：工业部门间和内部存在联系和互补。而这也许正是国家战略认为消费电子产业逐渐失势，导致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和计算机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领域中有立锥之地的真正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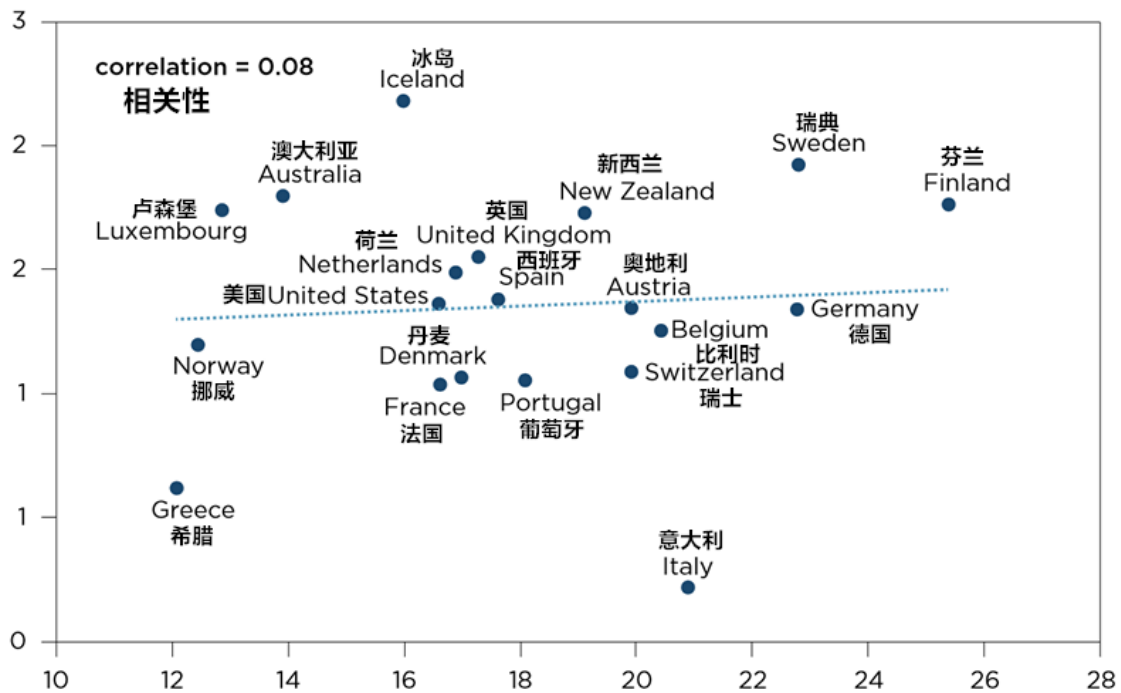
然而，这种违背常识的理由很难站得住脚。日本在消费电子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帮助他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虽然在研发方面存在路径依赖，但没有一个工业国家的研发能力会因为制造业份额低于某个临界值而一蹶不振。2016 年，美国的制造业份额约为 12%，而德国为 23.4%。然而讽刺的是，对德国的创新能力落后于美国的担心，是国家产业战略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真的缺乏创新能力，也应该是针对希腊甚至法国这样的欧盟国家而言：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份额从 1995 年开始就相对较低，而且之后还大幅下降。相比之下，德国应该继续提高其本已极高的制造业份额更是无稽之谈。

在 1995 年至 2016 年间，德国是唯一一个制造业附加值略微增加的主要工业国（见图 1b）。正如 Südekum（2018）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增长反映了两种特质。首先，“中国冲击”在德国是创造而不是扼杀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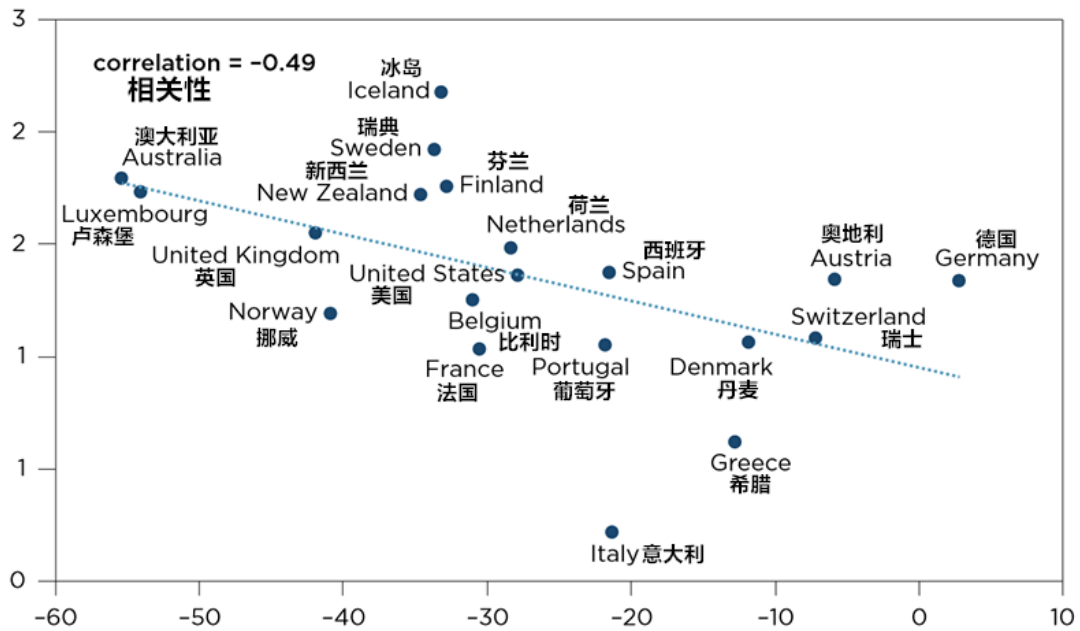
能够提供中国工业扩张所需的各类投资品。其次，德国的储蓄增加，这抑制了对服务的需求，并导致了 2000 年代经常账户盈余的急剧上升。这些因素将来不太可能持续了。如果持续（特别是储蓄的增加），可能会以其他欧盟国家加速降低其制造业份额为代价。因此，德国制造业份额预计将下降，正如其他发达经济体制造业份额下降一样。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他们对服务的消费增长速度超过制造业（Moneta 和 Stepanova, 2018）。与此同时，由于机器人和生产的外包，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往往高于服务业（Pilat 等人, 2006 年）。因此，服务业工作将逐渐取代制造业工作。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坏事：其中某些制造类工作岗位会被研究、咨询和其他商业服务岗位所代替。如果将这些工作外包给独立公司，这将被视为服务业工作而非制造业工作。然而，无论他们划分为哪个部门，都是良好的工作岗位。德国的经济政策应侧重于保护和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而不该考虑是在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业。

图 1 发达经济体人均资本增长与制造业份额之间的相关性，1995-2016

a 人均资本变化百分比（1995-2016）与 1995 年制造业份额的相关性



b 人均资本变化百分比与制造业份额的相关性



注：样本包含 1960-1970 年代加入 OECD 的所有成员国，但土耳其除外，因为其 1995 年人均资本收入水平过低，并且在样本期内测算 GDP 的方法存在问题。

无论动机如何，试图提高德国和整个欧盟的制造业份额会产生什么后果？德国“为每一个工业岗位而战”是否有意义？除非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否则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增加制造业附加值的唯一途径是增加其在全球制造业所占份额。国家工业战略要求到 2030 年欧盟制造业份额从 14% 增加到 20%。在此期间，世界（同时也是欧盟制造产品的潜在市场）将会发生变化。但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富裕，制造业在世界 GDP 中的份额应该从大约 16% 降至 14%（见附录 A）。如附录所示，欧盟制造品的市场份额需要大幅增加（从目前的 19% 上升到约 25%）才能实现目标。如此大幅度的增长可能需要欧盟的进口替代和欧盟制造业出口的大幅增加。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并且发达国家试图保护其制造业时，如果不爆发贸易或货币战争，这种增长将很难发生。如何看待提案的后果，不妨设想一下“为每一个工业岗位而战”付诸实践：国家战略表示对“脏旧”行业和“清洁新”行业区别对待是错误的，意味着失业问题将被全面抵制，即使在“脏旧”行业也如此。通过家庭生产自动化，离岸外包造成的一些失业问题可以被阻止或逆转，但是以这种方式留存下来的工作岗位数量很少，因为机器人主要接替的是原本会外迁的岗位。总而言之，保留工业岗位将意味着抵制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无利可图的企业不会退出市场。这些政策会损害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

长,从而削弱其竞争力(Bravo-Biosca, Criscuolo 和 Menon 2016; Decker 等人 2017)。经过一段时间,这会加速而不是阻止工业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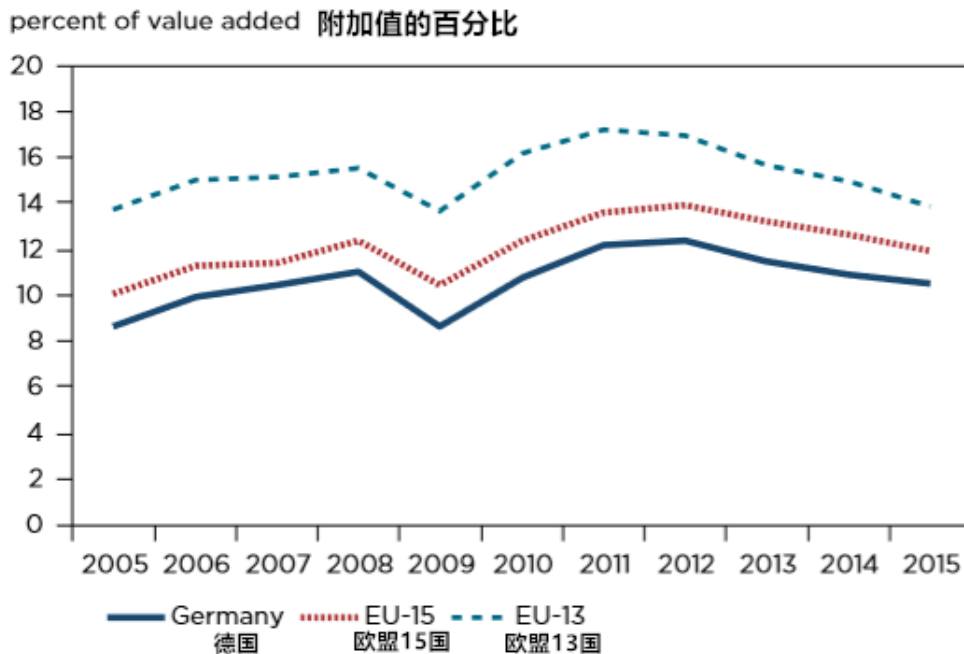
(2) 欧盟公司应该只参与欧盟价值链。国际价值链——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的跨境贸易——通过将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最有效配置来提高生产率(Baldwin 2016)。这种“分拆”可能发生的经济区域越受限制,潜在的效率增益就越小。初步看来,很难看出限制非成员国参与欧盟价值链,将如何有利于德国或欧盟的竞争力。国家战略中表示,一个经济领域内的价值链将“更具抵抗力”,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受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的影响。然而,这种说法本身并不是限制欧盟外的中间产品贸易的理由:假设欧盟公司从中国一家公司订购中间产品,他当然会理解这样涉及更大的风险,但依然不订购来自斯洛伐克的中间产品,因为这是将风险与从中国进口的成本优势权衡取舍后的决定。

调整政策以阻止从欧盟以外进口中间产品的做法建立在一个论点上:从潜在敌对国家采购关键投入品会产生国家安全风险,或者上游公司造成负外部性危害到价值链上其他环节。这两个论点都不能令人信服:国家安全风险可以通过限制特定投入品的来源国而不是将所有价值链保留在欧盟中;而负外部性只有在向下游公司收取较低的价格不能抵消价值链中断的潜在成本时才会产生。此外,如果出现任何此类外部性,可以通过对来自欧盟以外的中间产品进口征收关税而不是完全禁止此类进口来解决问题。

迫使价值链留在欧盟内部的政策有一个明显问题:根据 WTO 规则,这些政策可能是不合法的。他们恰恰是国家战略极力避免的保护主义。实际上,国家战略要求价值链的“重新回归”是该文件中最具特朗普特征的条款。除了这个问题,阻止从欧盟外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代价是相关效率的损失。这种损失的多少取决于进口的中间商品的重要性。图 2 显示了非欧盟进口品在德国以及欧盟 13 国(自 2004 年以来加入的成员国)和欧盟 15 国(2004 年以前加入的成员国)的出口附加值中的所占附加值比例。

虽然自 2012 年以来非欧盟进口附加值在欧盟出口中的份额一直下降,但 2015 年这个份额仍然很大:占德国出口的 10.5%,欧盟 15 国出口的 12.0%,欧盟 13 国出口的 14.0%。虽然这些增值中的一部分来自原材料进口,但大部分是中间投入(进口中如果不包括采矿和采石,非欧盟进口的欧盟 15 国出口附加值份额将会从 12%下降到约 10%)。要求欧盟企业替代非欧盟中间投入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图2 欧盟外附加值占欧盟国家出口总附加值占比，2005-2015



注：欧盟 13 国包括：比利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欧盟 15 国代表欧盟内剩余成员国。

数据来源：OECD TiVA 数据库

(3) 国家和欧洲扶持是必不可少，并且大力提倡的。国家工业战略中的国家和欧洲扶持观点包含两项主张：首先，规模很重要，欧盟和德国的竞争力取决于创建大型公司的能力。其次，目前的欧盟竞争法案有碍这些公司的建立，因此需要进行修改。对于第一点主张，国家战略认为，某些市场（如铁路系统和工厂建设）涉及大型项目的竞争，只有极大规模的公司才能获得此类项目的融资。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非常大的项目可能（并且经常会）涉及公司财团的竞标。如有必要，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来源获得资金，包括银行集团。正如欧洲委员会（2019a, 16）所说，“‘欧洲扶持’并非一定是一家公司。”只要它不减少欧盟内部的竞争，这种类型的合作在欧盟法律框架下是可以接受的（Motta 和 Peitz, 2019）。建立单一公司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可能是规模经济。生产的边际成本可能随着生产数量的上升而下降。只有当公司希望大量生产时，建立一个高效生产设施才有意义。如果每个单位的生产成本非常高，有人可能会说有效生产需要规模极大的公司，因为要使可变成本不断下降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大型商用客机经常被援引为一个例证。

(4) **国家必须积极干预以防止外国收购。**这项政策是因为害怕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主导，特别是在中国发布“2025 工业战略”之后。中国经常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获得核心技术，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延缓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意想不到的结果：1、抑制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而这是德国和欧盟初创企业非常依赖的风险资本来源；2、滋生民族主义，即使友好国家出于正当理由的收购，也有被德国公司拒绝的风险；3、被外国公司收购的企业往往是效率低下需要重组的企业，这不利于宣扬国家“为每个工业岗位而战”的政治口号。

(5) **国家必须干预以支持“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活动”。**为突破性创新活动提供国家支持。对研发活动的大力资助是因为创新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回报，不仅针对上游研究，下游研究工作同样适用（对其他企业具有示范效应）。对研发活动的大力支持也可以理解成，国家为实现本土公司在海外科技前沿领域技术垄断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意想不到的结果：1、政府很容易受到公司的政治俘获，不利于挑选真正优秀的企业进行发展；2、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永恒的抉择。以往的研究表明，政府并没有比市场在挑选优秀企业，淘汰落后企业上表现更优秀。与政府有政治关联的落后企业则会通过利益集团游说，阻止新兴企业的进入，而政府也难以下定决心从这些失败企业身上撤资。3、资助不具有“额外性”，对一些福利改进型活动进行资助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其本身具有外溢性）。

4、对国家工业战略的总结

五条提议的前三条——提高德国和欧盟制造业占 GDP 比重，将价值链封闭在欧盟区内，修改欧盟竞争法案以支持“国家和欧盟扶持”企业——只有在极其狭义的前提下才显得合理，剩下的两条——阻止外国企业的收购和为“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活动”提供国家支持——在市场失灵和系统性失灵的情况下则显得合理。而对外国企业核心技术的依赖也会导致政治脆弱性，为后两条提议提供更充分的理由。然而，这两条建议也很可能弊大于利。从经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回应中国的威胁帮助不大，德国应该制定超越工业战略层面的方针。管中窥豹，只会使工业战略所承载的负担累累。本文建议德国采取“两步走”的方法，首先通过政策为德国以及欧盟创造出生产率增长和创新的最佳外部环境；然后对于中国威胁有更多的应对措施。

与国家工业战略所制造的印象不同，德国有很多工业政策，涉及公私协调与合作的广泛领域。根据 OECD 数据显示，德国研发投入经费占 GDP 比重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就稳步上升，现在已经超过 3%。日本为 3.2%，美国为 2.8%，中国为 2.2%，韩国为 4.5%。国家工业战略可以作为解决市场失灵，使创新活动外溢的政策，但是不能作为本土公司对抗外国公司的保护伞（德国出口产品特别集中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市场）。即使工业战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也可能“胎死

腹中”，德国政府应该回答以下疑问：1、对研发的公共投入规模足够吗？特别是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2、公共支持是否目标明确？究竟是在支持前景良好的新兴企业还是在支持那些已存在的企业。3、国家面临上行风险的时候，相比债权，股权是否应该被更多予以重视。4、国家支持活动需要上升到欧盟层面吗？去中心化才能更好的应对政治俘获问题。5、工业政策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对于德国技术发展和生产力增长的限制因素吗？其他因素包含：德国落后的运输和数码基建、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大学系统的教学和研究能力有待提升、稀缺劳动力的无效错配、缺乏欧盟天然的单一市场。

那该如何应对中国挑战？主要担心来自三个方面：1、受国家支持的中国企业抢占更大份额，2、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的松散，西方国家技术拥有者未能得到很好的补贴，3、害怕西方国家消费者和公司依赖于极权政府制下公司的核心技术。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需要德国政府用政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外，还需要WTO机制正常运作，包括对国内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问题的仲裁。同样，欧盟层面的政策工具包包括：1、对非欧盟国家政府的国家资助进行制裁；2、要求欧盟企业在面临强制技术转让或知识产权剽窃时进行披露。但是政策的实行遇到阻力，欧盟成员国中有一部分政府希望吸引中国投资。如Rodrik（2004）所提到的，“防御性”工业政策需要甄别和资助特定的技术。欧盟需要在未来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洞悉私人部门发展的新动向，同时不能被大型企业所俘获。为此，欧盟应该像其他国家学习发展经验，比如美国和法国。

这与阿尔特迈所提出的“国家工业战略”有很大的区别：在他的文件中，“任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活动”都应该被给予国家支持。而在文章给出的建议中，是由技术专家而非政客来决定，哪些项目值得政府的资助。

5、结语

德国的国家工业战略有一些“坏点子”：继续提升德国制造业份额而不是去关注优质的工作岗位和生产率增速；不鼓励欧盟公司参与到域外的价值链中；明知减少竞争，也要建立“国家和欧盟扶持”的企业；用政府接管来驱逐外国投资；对“任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活动”没有明晰的定义，留给政客宽裕的操作空间。尽管提议中的大部分内容具有误导性，但是德国的国家工业战略中所体现的关注却是真切的：德国和欧盟如何激活生产效率，保持留在技术前沿；面对迅速崛起的工业大国——中国——德国应该如何应对。除了工业战略中所提及的部分，德国需要在其他领域“解绑”以提升生产力增速，包括基建投资缺口、熟练劳动力和科技人才的错配、缺乏欧盟天然的单一市场。而面对中国崛起，德国需要保护本国企业免受中国企业的 unfair 竞争。除了WTO机制需要正常运作之外，欧盟

工具包需要有制裁强制技术转让的措施。欧盟在未来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识别新兴发展的企业，同时要做到避免被大型企业所俘获。

阿尔特迈的初衷是好的，为了激活德国和欧盟的经济活力，但是大部分内容是错误的。为了更好地制定经济政策，下一步应该对现存的工业政策进行仔细诊断，确定超越工业战略层面的行动方针，为应对中国采取更广泛的准备。

本文原题为“The Return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Germany”。本文作者 Jeromin Zettelmeyer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 Dennis Weatherston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可能来自德国

Jacob Funk Kirkegaard/文 吴克谦/编译

导读：近期，有猜测认为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将会担任欧洲央行下一任行长。目前，欧央行使用货币政策措施的自由度在下降，因此在应对下次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至关重要，一位来自德国的行长更有希望说服德国带头实施逆周期财政政策。此外，魏德曼也很可能获得默克尔的支持。编译如下：

欧盟领导人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6月之前决定至少四家机构的下一任领导人：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央行（ECB）、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和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将于5月下旬选出的欧洲议会将对这些选择有发言权，但是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必须同意这项“人事一揽子计划”。然而已经有猜测认为德国人会担任欧洲央行下一任行长，最有可能的人选是德国央行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

魏德曼的任期最近被延长了8年，此前他曾担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首席经济顾问。自2011年加入欧洲央行执委会以来，他忠实地扮演了默克尔在欧洲央行的“德国坏警察”角色，为默克尔批准必要的欧元区危机干预措施开辟了国内政治空间。这一立场理所当然地导致魏德曼受到了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和其他支持欧洲央行必要货币刺激措施的人士的敌意。然而，在下一次经济低迷时期，由于他早些时候反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使得他成为了向德国政府倡导财政刺激的优秀使者。

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使用货币政策措施的自由度将不如德拉吉。鉴于欧洲央行最近延长了短期政策利率前瞻性指引，当下一次周期性衰退来临时，欧洲央行很可能将处于或接近于零利率下限。欧洲央行新一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III）也确保了欧元区银行在可预见的未来拥有充足的流动性。因此，下任欧洲央行行长的货币政策工具将仅限于购买风险更高的私人资产（例如股票、公司债券和高级银行债）或放宽欧洲央行对自身持有主权债务的限制。

这些措施将是微妙且有争议的。在欧元区市场购买私人资产将被批评为“选择赢家”，并可能使欧洲央行面临巨大的信贷风险。同时，超过目前自行设定的主权债券购买上限则有可能被欧洲法院（ECJ）认定为非法。

这些限制使得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至关重要。因此，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将不得不说服德国带头。显然，一位来自德国的欧洲央行行长——最好是有保守资历的行长——最有希望这样做。从本质上讲，德国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更多的财政政策和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在下次衰退中可能进一步扩张之间做出选择。

难怪许多人应该为下一任欧洲央行行长是德国人而欢呼。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各国政府已排除了制定一份规模可观的欧元区共同预算的可能性，因此，所需的逆周期财政政策应对只可能来自于成员国。

有几个因素使得魏德曼最有可能在 6 月获得默克尔的支持，其中包括默克尔的盟友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前景日益黯淡。他领导的欧洲人民党（EPP）预计将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失去 40 多个席位；此外，他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长期且直到最近还保持着的密切关系，也不利于他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因此，随着这位德国候选人的退出，默克尔将考虑再挑选一个德国人担任欧盟的另一个高级职位。

欧洲央行行长是该地区权力最大的经济职位，尽管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还没有德国人担任过这一职务。如今，说“现在轮到德国了”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上一次在 2011 年，德国人阿克赛尔·韦伯（Axel Weber）突然辞去了德国央行行长一职，为意大利人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接替法国人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成为欧洲央行行长铺平了道路。默克尔可能会支持其他来自于与德国结盟的欧元区小国的潜在候选人，就像 1999 年荷兰人杜伊森伯格（Wim Duisenberg）被提名为该职位的候选人一样。但是在 2019 年，默克尔支持一位非德国候选人没有任何好处：国内选民期望德国人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因为这一职位近十年是欧洲最有权势的政治家。同时，出于平衡地区利益的考虑，这种预期目前尤为高涨，因为西班牙人最近被任命为欧洲央行副行长、意大利人负责欧洲央行的银行监管、葡萄牙人执掌欧元集团。

欧洲央行高度的机构独立性实际上要求其行长必须来自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内部，这使得德国央行副行长克劳迪娅·布奇（Claudia Buch）是唯一可能的德国黑马候选人。她能够调节欧洲央行高层的性别失衡，但缺乏经验。

世界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担心一位来自德国的欧洲央行行长会实行强硬的鹰派货币政策呢？不，因为拥有 21 个投票成员的理事会仍将由宽松货币政策的倡导者主导。实际上，德国一直专注于“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欧元区通胀温和但劳动力市场趋紧，这似乎是欧元区利率持续保持低位的最佳保证。就像尼克松访问中国一样，一位来自德国的欧洲央行行长将别无选择，只能敦促德国政府出台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

本文原题为“Why the Next ECB President Will Be from Germany—and Probably Jens Weidmann”。本文作者 Jacob Funk Kirkegaard 是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3 月 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能源业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角色的变化

Sarah Ladislaw 和 Jesse Barnett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 进入 21 世纪以来, 美国能源业的消费总量、技术水平与政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最近发布的一篇专题报告中, 笔者就能源业未来在美国经济中扮演角色的变化做了集中分析。本文是该报告的摘要部分, 编译如下:

过去二十年来, 受国内外冲击的影响, 美国能源行业的生产、消费和进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 2000 年, 美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同时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如今, 中国早已取代美国, 成为了世界头号能源消费和排放大国。20 年前,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和政策界人士都非常担心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在 2000 年做出的估计, 到 2020 年, 美国日均将进口超过 1690 万桶石油。然而真实情况是, 截止 2018 年, 美国日均进口石油总量仅为不到 100 万桶。不过在当时, 弥漫在美国能源政策界的悲观情绪确实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那时, 美国国内的油气生产双双陷入停滞、太阳能和风能利用对全国能源总消耗的贡献极为有限, 而全美发电总量的 55% 依然依靠燃煤 (如今这个数字已降至 30%)。此外, 尽管新能源技术的实用化纷纷开始被提上日程, 但在当时看来新能源 (如电动汽车) 的大规模利用还显得遥遥无期。

我们在分析美国的能源政策时, 当然不能脱离政策背后的宏观经济环境。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当中, 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驱动的——仅中国一个国家就贡献了 2000 至 2017 年间全球新增 GDP 的四分之一。显然, 在这种背景下, 高油价和潜在的能源短缺问题自然会使美国的能源政策界忧心忡忡。因此, 当时美国对替代性能源的发展异常重视, 其中的代表包括核能、生物燃料、氢燃料、太阳能和风能。随着时间推移, 部分新能源技术日趋成熟。2008 年金融危机后, 在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下, 一些更前沿的新能源技术 (包括藻类燃料、纤维乙醇、太阳能热泵、离岸风电、潮汐发电等) 也越来越接近实用化。因此, 美国能源界开始逐渐意识到, 未来的能源价格并不一定会一路上扬。相反, 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 美国可能将享受种类更多、成本更低的能源供给。

如今, 美国和全球经济结构都变得更加复杂了。尽管过去 20 年来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良好, 数以亿计贫困人口脱离了贫困, 但发达国家内部逐年扩大的不平等程度依然对经济平稳发展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在美国, 对不平等问题的担忧往往反映在就业和工资增长停滞上。尽管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的就业率和 GDP 增速已经是名列前茅, 但担忧和失望的情绪依然弥漫在全美各界。其中, 人们对低技能水平工人的就业前景尤为担忧, 而全球增速放缓的预期更加重了这

种担忧。但是，在这种灰暗的大背景下，能源业却逆势上扬，成为了美国经济当中的一抹亮色。走低的能源成本、更加丰富的能源形式、更加充足的能源供给，以及更加清洁的排放水平都使得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欢欣鼓舞。但在如今的公众看来，能源行业在美国经济当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除去生产要素的角色，社会各界还期待能源行业为美国的就业和区域经济增长做更大的贡献。显然，政策界和企业界人士也应当积极回应这些关切。

在未来，对美国的能源界而言，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大趋势。一是利好趋势：美国由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出口国，且净出口量不断增长。除了页岩油的大规模开采外，特朗普政府对美国能源企业包括放松监管、减税、优化外贸条件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利好也助推了这一趋势。二是利空趋势：尽管特朗普本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我们预计联邦政府还是会采取政策促使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当然，这两大趋势未必就是水火不容的——比方说，一些推进能源出口的联邦部门同时也是推动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但是，从宏观上来说，传统能源企业依然有必要充分意识到，美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向低碳环保型经济转型。

因此，未来能源业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将继续受到市场、政策和技术进步的共同影响。在本份报告中，除了预测未来政策界和业界的决策动向外，我们还重新评估了美国能源行业的基本面情况。我们在文中的观点主要来自历次内部讨论的结果，这些观点不仅适用于业界和政策界人士，同时也可以对能源行业的研究者起到参考作用。本报告主要覆盖三大领域的问题：油气开发的最新动态、能源业的技术创新，以及结构转型与政策评估。

本文原题为“The Changing Role of Energy in the U.S. Economy”。本文作者 Sarah Ladislaw 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高级副总裁、资深研究员、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Jesse Barnett 是 CISI 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助理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不但担忧德国，也担心欧盟的国家主义

Jeromin Zettelmeyer / 文 申劭婧 / 编译

导读：面对中国和美国竞争威胁，欧洲各国希望采取措施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地位。但是，目前的政策已经走上了经济民族主义的道路，长远来看不仅不会达到目的，反而会使得欧洲之前繁荣的根基受到削弱。因此作者认为，这一势头必须得到遏制，欧洲应该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来保证其利益。编译如下：

德国和法国的政客们一直认为，欧盟 (EU) 应该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竞争威胁做出更有力的反应。促使这一现象的一些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拟议中的应对措施，如削弱欧盟内部的竞争规则以增强欧洲的优势（可能涉及法国和德国的大公司），采取中国式的产业政策，甚至可能限制国际贸易等，更有可能削弱而非促进欧盟的创新和增长。这也将降低世人对欧盟倡导开放、多边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张的信任。

欧盟的经济成功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在欧盟内部，经济一体化和强大的共同机构通过确保企业和消费者进入庞大的内部市场、增加竞争、与国内选民保持正常的监管和监督关系来创造增长和繁荣，并为私人和公共风险分担创造机会。与此同时，一个繁荣和统一的欧洲比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更有可能在全球舞台上维护其价值观和利益。这涉及最大限度地推动建立一个体现欧盟价值观，即基于规则的竞争和国际一体化的多边框架。但这也需要欧盟在利益受到攻击时捍卫自己的利益：可能的攻击情况包括贸易伙伴未能执行知识产权、征收关税或制造事实上的进入壁垒等。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以相同力度推行这些经济政策的不同层面，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然而，最近，这样的问题更加严重。原因是欧盟政客越来越感觉到，欧盟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外部威胁。这一事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特朗普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以及其品牌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应。后者包括为帮助国家在竞争中占据先机而进行兼并、国家广泛参与或支持特定公司和行业、向外国竞争关闭“战略”部门以及强迫技术转让。欧盟政客们是对的，这些挑战需要的应对措施超越往常。美国的保护主义必须被遏制，中国人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欧洲必须避免依赖由威权政府控制公司掌握的技术。

问题是，欧盟政客在急于击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时，开始倡导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虽然没有要求关税——除了对潜在的美国关税的报复——但一些组成与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相同。例如，德国的 2030 国家工业战略建议促进国家和欧洲在竞争中的优势，即使这会损害欧盟内部的竞争；向被认为“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部门提供广泛的 国家支持；以及欧盟内部“维持封闭价值链”。

法德联合宣言主张修改欧盟规则，希望允许代表成员国的欧盟理事会推翻欧盟委员会的合并禁令。

这些都是可怕的想法。它们以塑造更多外部自信的名义，破坏了欧盟经济成功的内部因素，即强大的维持竞争的措施和能够支持市场、同时最大限度减少私人获取利益风险的治理结构。它们还将削弱欧盟在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的信誉。

众所周知，竞争下降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也减少了投资和创新。同样得到公认的是，对国家竞争的政治支持通过隐性担保和提高规制俘获给消费者和纳税人带来风险。大众公司的排放丑闻以及最近的波音公司案就是例子。与此同时，支持超大型并购的主要论点——全球市场的有效竞争需要非常大的公司，其实并不令人信服。正如德国和意大利的“隐藏冠军”所展示的，各种规模的公司都可以在全球取得成功。而如果一个全球项目对现有的欧盟公司来说过于庞大或复杂，“获胜的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合作组织，或者是一个服务相互补充的公司联盟”，正如欧盟委员在最近一篇出色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

在产业政策方面，德国的国家工业战略似乎是在如下假设下运作的：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是中国表现良好的原因（该论文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在产业政策方面特别成功的国家”）。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政策是否即使在中国也奏效。在一本新书中，尼古拉斯·拉迪将近期中国生产率增长下降归因于竞争的下降，以及将越来越多的资源引导到非生产性的国有企业。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曾说，“中国制造 2025”（激励德国国家工业战略的倡议）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并不是说产业政策本身是不好的，而是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动机的产业政策比寻求纠正广义市场失灵的产业政策成功可能性低得多。产业政策应支持具有最大潜力的新活动，提供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例如，通过在德国已经存在的竞争性研发资金支持）。财政激励应该刺激而不是减少竞争。而重要的是，决定产业政策成功与否的与其说是“挑选赢家的能力，不如说是让输家退场的能力”。当政治家们决定一个部门或公司必须得到支持，帮助它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时，这些目标就更难实现。

正如我在最近的 **PIIE** 政策简报中所指出的那样，欧盟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无论来自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竞争威胁如何，它应该首先确保包括但不限于产业政策的经济政策尽可能支持企业保持活力和生产力增长。此外，应该有相关政策惩罚非欧盟国家政府强迫技术转让和国家援助，以及敦促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改进和更好的执行。甚至一个专门针对西方国家有可能必须依赖于中国的技术的欧盟层面研发计划也可能会发挥作用。除了充足的资金外，这样的方案还需要一个能够避免被大公司或部门占领，并能保持或增加竞争的治理结构。

欧盟领导人担心中国是正确的。他们挑战正统，寻找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更多更好的方式也是正确的。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该寻找产业政策的最佳做法，而不是中国的做法。他们还应该记住，国家可以通过一些久经考验的方式来支持经济增长，比如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或建立一个真正的欧盟单一市场——目前不管是对许多欧盟国家，还是对作为整体的欧盟来说，这一理想状况都远远没有达到。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应该为了对中国或美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而采取威胁欧盟繁荣基础的政策。

本文原题为“The Troubling Ris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本文作者 Jeromin Zettelmeyer 是 PIIE 的资深研究员。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欧贸易谈判困难重重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近年来，以钢铝关税和汽车关税为代表，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愈发升级。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前景如何？阻力来自何方？作者给出了分析，并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编译如下：

目前，欧洲议会尚未批准欧盟委员会与美国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相反地，议会决定暂不针对美欧贸易谈判做出任何决议。尽管这项决议并不具有强制力，但这仍然为尚未开始的美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发起的钢铝关税是美欧谈判面临的重要障碍之一。尽管取消钢铝关税显然是展开正式谈判的前置条件，但欧盟宁愿在尚未取消关税的前提下磋商谈判条件，意味着欧盟先前针对贸易战的强硬立场已经出现软化。此外，欧盟先前也曾表示不会与拒绝签署 2015 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达成任何自由贸易协定。目前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欧盟恐怕要再度食言了。更危险的是，美国此前曾威胁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但暂时尚未执行。一旦美国落实这项关税政策，将使得潜在的美欧谈判立即中断。

即便美欧真的展开贸易谈判，我们恐怕也不能奢望无疾而终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能起死回生。但是，当年 TTIP 谈判中双方争论的那些核心问题，美欧这次也同样会遇到。就目前来说，美国和欧盟在贸易协定的覆盖范围上存在巨大分歧，最突出的问题集中于该协议是否适用于农业。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很难说美欧谈判必然会取得成果。因此，为了取得谈判的成功，双方有必要采取多种措施共同推进美欧贸易谈判。考虑到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小处着手、重点突破，争取先取得局部性进展。从 TTIP 谈判的历史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想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美欧双方都满意的、全面的一揽子协议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在未来的谈判中，美欧双方应采取一事一议、平行展开的方式，按照议题各自的时间表进行谈判。笔者建议双方本着建设性的态度，从小处着手，争取在各项问题上先取得突破。举例来说，在汽车安全的问题上，双方可以就监管合作先达成共识。此外，美欧双方还应就实现工业品的关税自由化进行努力。最重要的是，美欧双方都有动机按这种原则推进谈判。对于美国而言，他们希望在 2020 年选举前兑现特朗普的竞选承诺；而对于欧洲来说，他们也希望尽快取得进展，从而避免被征收箭在弦上的汽车关税。更重要的是，如果双方能就部分问题尽快达成共识，无疑将为未来全面的自贸协定谈判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充分吸取 TTIP 谈判的教训。尽管欧盟应该坚持 TTIP 背后蕴含的价值观,但新一轮的美欧谈判不应成为 TTIP 的 2.0 版本。具体来说,欧盟应吸取 TTIP 的教训,排除其中过于有争议性的内容,比如有关农业的条款。广义来讲,欧盟在谈判中应当与美国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使得新的谈判内容既能规避双方无法取得共识的议题,又能充分覆盖各领域的美欧贸易活动。此外,新的谈判还应吸取 TTIP 谈判中具体方法的教训。

三是尽力避免美欧分歧进一步加深。新一轮的美欧谈判要求双方在政治上都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但遗憾的是,由于美国一味奉行“美国优先”原则,而欧洲当前又面临着英国脱欧和欧盟议会选举两件大事,美欧双方都不能保证对贸易谈判释放足够的善意。一旦谈判受挫,美国很可能回到威胁征收汽车关税的老路上来,这将使得早已出现裂痕的美欧关系雪上加霜。在未来的谈判当中,美欧双方的谈判者都应该明确一点:成功的谈判固然将使得美欧关系更加巩固,但失败的谈判可能使得二者的关系更加恶化,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形显然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

四是努力为国际贸易纠纷的调解树立榜样。在目前的大背景下,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美欧双方应从大处着眼,为复杂的国际贸易纠纷调解探寻出一条有建设性、推广性的解决途径。举例来说,针对美欧双方共同关心的中国问题,为了促使其加快国内的结构改革,美欧双方应戮力同心,携手共商解决之道。此外,美欧还应加强与日本的多边合作。美日欧三方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三者能够在中国问题上统一立场,那中国就更有可能尽快做出实质性让步。

五是尽快探索出一条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方法。对于欧盟来说,尽管特朗普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但欧盟也有必要对其中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给出建设性的回应。举例来说,德国的结构性贸易盈余问题不光是特朗普攻击的目标,IMF 和其他欧盟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担忧。显然,这种问题不能简单归结到特朗普个人头上。另外,欧盟绝不能被动地坐等特朗普下台。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 2020 年有可能连任成功,即便届时民主党重夺大位,特朗普提出的一些保护主义政策也可能得到沿用。

对于欧盟来说,取得谈判胜利的前提在于欧盟各国能够用统一的声音与美国对话。然而,本次欧洲议会决定暂不对美欧贸易谈判给出任何建议,这无疑显示了欧盟各国在这一问题上高度分化的立场。我们希望各国能尽快达成共识,并通过欧洲议会授权欧盟委员会,实质性推动美欧贸易谈判。这不仅将结束美欧在贸易问题上的拉锯状态,也将对处于危机的国际贸易体系大有裨益。

本文原题为“EU-US Trade Relations: The Way Forward”。本文作者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资深地缘经济学专家。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白人种族恐怖主义有多严重？

Bruce Hoffman /文 凌枫/编译

导读：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对新西兰两座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引发了人们对暴力极右翼分子威胁的新担忧。袭击事件发生后，西方民主国家就极右翼分子威胁的严重性展开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辩论。编译如下：

本月发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的袭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白人种族主义威胁急剧上升的担忧。情况有多严重？

白人种族恐怖主义及其变体——包含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移民和反政府情绪——已经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存在了几十年。在过去，他们的行为大多是孤立、间歇性的暴力。然而在今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将心怀不满的不同个体团结在一个回音室里，使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更具凝聚力，进而使得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变本加厉。

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对极右翼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视而不见，却对伊斯兰恐怖主义保持着密切关注。意义何在？

由基地组织和自封的伊斯兰国构成的、组织相对完善的跨国恐怖主义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里消耗了情报和执法机构的注意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来自极右翼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被排除或忽视。即使是在全球反恐战争的高潮时期，联邦调查局的战略计划也将“右翼极端分子、拥护反政府或种族主义情绪”的“独狼”暴力列为国内恐怖主义的一个突出威胁。2016年，英国采取了明显的行动，禁止新纳粹国家行动组织。

白宫于2018年10月1日发布了最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值得注意的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发布的四份反恐战略文件中，这是第一份旨在呼吁人们关注国内外日益加剧的白人种族主义/极右翼恐怖主义威胁的文件。

毫无疑问，为了应对白人种族主义/极右翼恐怖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新西兰的清真寺袭击事件将在国内外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资源。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即使国内外恐怖主义威胁变得层出不穷、复杂多样，打击恐怖主义却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据报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于下月就白人种族主义的兴起举行听证会。执法人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抗这种威胁？

五年前，当美国执法机构被要求找出他们所面临的最严重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时，他们列举了极右翼势力、反政府极端分子，紧随其后的是受沙拉菲圣战（Salafi-jihadi）启发的极端分子、激进环保主义者和种族主义暴力极端分子。但是，随着暴力白人种族主义的兴起，极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日益壮大，以及 21

世纪通讯平台的力量，这种威胁正在迅速演变。美国和其它地方当局需要对这些激进活动、人员招募、交换行动及袭击信息的危险进展有所了解，识别出可能的迹象将有助于干预和预防，并有望挫败未来的恐怖主义事件。当局需要更多的情报共享、培训和教育，以跟上这一不断演变的动态威胁。

当局该如何应对此类平台？

社交媒体的力量将新西兰的恐怖袭击变成了一种反常的行为艺术。

新西兰当局展示了政府如何能够迅速干预，限制这种令人反感的网络宣传传播，但这是一种应对，而不是预防，后者将成为政府与这些平台之间密切审查和讨论的主题。与任何对社会的威胁一样，必须在维护言论公开自由与公民所期望的政府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媒体对独狼恐怖分子的崛起负有部分责任吗？

这虽不是原因，但却无疑是促成因素。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动态。基地组织使用的是 20 世纪不合时宜的媒体，而伊斯兰国使用的是 21 世纪的数字平台。2001 年 12 月，当时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现任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Ayman al-Zawahiri）在伦敦一家阿拉伯语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呼吁世界各地的基地组织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基地组织被驱逐出阿富汗之际实施个人恐怖袭击。由于该书出版发行有限，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十三年后，伊斯兰国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纳尼（Muhammad al-Adnani）向该组织的追随者发出了类似的呼吁。阿德纳尼使用最先进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和其它平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和美国发起攻击，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本文原题为“[How Serious is White Nationalist Terrorism?](#)”。本文作者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反恐和国土安全高级研究员 Bruce Hoffman。本文刊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 CF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大国竞争时代的“航行自由”

Bob Jones/文 王梦瑶/编译

导读：作者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美苏之间关于航行权利的争端及其解决方式为例，讨论了解决美国与中国之间关于海上航行问题的可能性及其方式。作者认为，有鉴于美国目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计划，伴随着美中海军之间的接触增多，美国海军与中国海军之间的行动环境将越来越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之间的行动环境。尽管目前两国之间有协商机制，但存在关键性的缺陷，未来应优先弥补既有机制的缺陷，使之能够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编译如下：

美国海军的“航行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主张——这项过度伸张海上权利并展示美国海上自由承诺的策略，过去几个月其在南海的举动引起了很多新闻报道，尤其是在去年 10 月中国的驱逐舰差点与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相撞之后。美国的“航行自由”主张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愤怒——一名中国高级上校建议打击以“航行自由”名义行动的美国舰船。实际上，在最近的大国竞争历史上，这些行动及其引发的不快反应并非新鲜事。正如大卫·温克勒（David F. Winkler）在他的著作《海上事故》（Incidents at Sea）中所记载的，人们只需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情：当时美国和苏联在同一问题上争吵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为美国处理如今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几个教训。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海军紧张局势升级。这部分是由于苏联海军扩展其在地中海东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海军行动，使苏联和美国舰船之间的遭遇更为频繁。两国对海洋权利持有相互矛盾的看法，并各自采取措施强化自身立场。卡特总统于 1979 年发起了一项具有挑衅性的“航行自由”计划，以捍卫公海航行权并要求过度的领土主张。三年后，苏联以航行法作为回应，拒绝承认任何无害通过其黑海领海的权利。

随着两国海军之间的遭遇增加，加上美国海军每年执行 35 至 40 次“航行自由”行动，导致这十年间发生了几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包括舰船碰撞、苏联向美国舰船发射照明弹和警告性射击。局势一度紧张到美国警告其指挥官不要挑衅苏联，尽管在秘密信息中指挥官们被要求在面对侵略时不得表现出“胆怯或顺从”。然后，在冷战的最后时期，苏联对“航行自由”的反应变得更具敌对性。1988 年 1 月，一名苏联海军上将宣布美国的“航行自由”非法，并补充道，“未来任何侵犯我们主权的外国舰船都应被摧毁。”接下来的一个月，在美方无视口头警告之后，两艘苏联舰船故意在黑海碰撞美国“约克城”号和“卡洛”号巡洋舰。

这些事件没有进一步失控，部分至少要归功于美苏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一系列海上事件发生后达成的协议。《海上事故协定》（Incidents at Sea Agreement）是两国之间建立信任的措施，它制定了美国和苏联海军在彼此行动

靠近时须遵循的准则，为潜在的危险举动提供了预先通知机制，并建立了解决问题的渠道。它还推进了年度审查会议，二者可以由此进行坦诚的交流。在 1988 年会议期间，一名苏联海军上将透露，对美国“航行自由”主张的严厉回应，包括故意碰撞在内，与苏联海军受到的政治压力直接相关。事实证明，《海上事故协定》非常有效，至今仍然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发挥着作用。

这段历史与中国今天对美国“航行自由”主张的反应有明显的相似之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增强及其在西太平洋以外的行动范围扩大，美国与中国海军之间会有更多互动。有鉴于美国目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计划，美国海军与人民解放军海军之间的行动环境将越来越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苏之间的行动环境。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冷战期间的舰船碰撞和海上事故将会重演，但最近中国领导层的声明、中国海军舰艇和飞机在南海偶尔的进取行为，都显示出美中之间的海军互动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美国海军必须做好历史重现的准备。

即便海军准备好了在日益紧张的环境中行动，美国也不应放弃与中国及其军队建立信任措施。中国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保持接触，并且中国是 2014 年签署的《计划外海上遭遇准则》签署国（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此外，美国国防部和中國国防部已经签署了一个部门间协议——《军事海事协商协议》（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这类似于美苏之间的《海上事故协定》。不幸的是，正如温克勒指出的那样，协议的协商过程仍受政治支配，直接的军事对军事通信渠道并未建立起来，且协议过于非正式，以致无法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因此，填补这些缺陷应是一个优先事项。

本文原题为“Tens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Put EU in Tough Spot”。本文作者 Maria Demertzis 是布鲁盖尔研究所的副主任，曾在欧洲委员会和荷兰中央银行的研究部门工作。本文于 2019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 (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家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 (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 (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